

新疆出土织锦及其代表性价值

李文亮^{1,2}, 刘伟唯²

(1. 伊犁师范大学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新疆 伊犁 835100;2. 伊犁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伊犁 835100)

摘要:为探析新疆织锦在我国织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织锦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统计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出土织锦数量、纹样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在我国织锦出土地区中,新疆出土织锦最为丰富,且织锦铭文与纹样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与审美风韵,是中华传统吉语文化之微观缩影,代表了中国历代织锦的基因血脉,彰显了中国历代织锦的流彩神韵。该研究旨在深化以新疆织锦为焦点的丝绸之路对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贡献,从而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新疆;丝织品;铭文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中国历代织锦面貌

中图分类号:J 523. 1;J 523. 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2-0147-07

Xinjiang Unearthed Brocade and Its Representative Value

LI Wenliang^{1,2}, LIU Weiwei²

(1. Borde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li 835100, China;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li 8351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Xinjiang brocade in Chinese brocade, this paper took brocad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unearthed brocade in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ata statistic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study shows that among the regions in China where brocades have been unearthed, those from in Xinjiang are the most abundant. The inscriptions and patterns of brocades reflect the social trends and aesthetic charm at that time ,serving as a microco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language culture. They represent the genetic blood of Chinese brocades in past dynasties and highlight the charm of Chinese brocades in past dynas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epe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lk Road, which focuses on Xinjiang brocade, to the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o a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Xinjiang, silk fabrics, inscription-brocade, brocade of " five stars rising from the east benefit China", the appearance of brocade in Chinese history

中国被誉为“丝绸古国”,其中织锦具有代表性。织锦雍容华贵,寸织锦寸金,蕴含着中华服饰的审美范式与文化的深厚底蕴,承载着绵延不绝的

中华丝绸文明,是古时中原与其他各地方交流的重要实质载体。在我国所有织锦出土区域中,新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留存了大量的织锦。

收稿日期:2023-10-02; 修订日期:2024-03-01。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21-GMB-037);伊犁师范大学提升学科综合实力专项项目(22XKSY01);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J2023G265);伊犁师范大学高级别培育项目(YSPY2022005);伊犁师范大学创新培育团队计划项目(CXSK2021006)。

作者简介:李文亮(1982—),男,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与新疆出土文献文史。

Email:wenliang_l@163.com

然而,诸多学者对织锦的研究仅局限于较有代表性的几例织锦,或只关注某一时期,并未对我国出土织锦进行系统性梳理,对新疆织锦的重要地位也未有著述。因此,文中基于国内外相关织锦文献,将研究重点放在新疆出土织锦,统计新疆出土织锦数量,梳理新疆出土织锦上的高频词语及主要纹样内涵,对新疆出土织锦可以展现中国历代织锦面貌的原因进行讨论,从而论证新疆出土织锦在中国出土织锦中的代表性价值。

1 新疆出土织锦

1.1 新疆出土织锦数量

据现有资料统计,目前国内外已知出土织锦数量共计 558 例。其中,春秋战国织锦 38 例,占比 6.81%;汉晋织锦 138 例,占比 24.73%;宋代织锦 23 例,占比 4.12%;隋唐织锦 235 例,占比 42.11%;元代织锦 9 例,占比 1.61%;明代织锦 44 例,占比 7.89%;清代织锦 14 例,占比 2.51%。从数量来看,汉晋、隋唐为织锦发展的黄金期,新疆出土汉晋时期织锦 103 例,出土隋唐织锦 95 例。

织锦出土地区分布及占比情况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我国织锦出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 4 大区域。相较而言,出土织锦大多分布在我国西北部,尤以新疆最为丰富,占出土织锦总量的 40.14%。

表 1 织锦出土区域及数量

Tab. 1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unearthed brocade

分布区域	出土地区	织锦数量/例	占比/%
中国西北	新疆	224	40.14
	甘肃	101	18.10
	青海	42	7.53
	陕西	1	0.18
中国华中	湖南	48	8.60
	湖北	10	1.79
中国华北	北京	25	4.48
	内蒙古	23	4.12
	河北	1	0.18
中国华东	江苏	4	0.72
	浙江	3	0.54
	山东	2	0.36
中国西南	西藏	4	0.72
中国东北	黑龙江	1	0.18
国内出土地不明者		38	6.81
其他	国外收藏及		
	出土地不明者	31	5.56

1.2 新疆出土铭文织锦和无字织锦数量

已知的 558 例出土织锦中,铭文织锦 107 例,占

比 19.18%。107 例铭文织锦中,汉晋织锦 92 例,隋唐织锦 8 例,明代织锦 2 例,5 例待考。由此可以看出,汉晋织锦在铭文织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出土地区来看,新疆出土铭文织锦 85 例(楼兰遗址 28 例^[1],尼雅遗址 26 例^[2],阿斯塔那墓 11 例^[3],罗布泊地区 11 例^[4],洛浦山普拉墓 2 例^[5],且末扎滚鲁克墓 1 例^[6],加瓦艾日克墓 1 例^[7],待考 5 例^[8]),内蒙古 8 例(诺因乌拉墓 7 例,扎赉诺尔东汉墓群 1 例^[9]),西藏 3 例(阿里噶尔县古如加木寺 1 例,故如甲木墓地 2 例^[10]),北京 2 例(北京定陵 2 例^[11]),青海 1 例(都兰遗址 1 号墓^[12]),甘肃 1 例(武威磨嘴子^[13]),湖南 1 例(长沙马王堆),出土地不详者 6 例。由此可知,铭文织锦以汉晋织锦为主,其中 79.49% 出土于新疆。

无字织锦亦以新疆为主要出土地。451 例无字织锦中,新疆出土 139 例,占比 30.82%,其中,88 例见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其他分布在尼雅遗址、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14]、罗布泊遗址^[15]、乌鲁木齐东南盐湖^[16]、阿拉尔遗址^[17]、巴达木墓^[18]、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等处。除新疆外,甘肃出土 98 例^[19],湖南 47 例^[20],青海 41 例^[21],北京 23 例^[22],湖北 10 例^[23],内蒙古 7 例^[24],山东 2 例^[25],河北 1 例^[26],陕西 1 例^[27],出土地不详者 82 例。从墓葬的年代看,战国墓 38 座,汉晋墓 46 座,宋代墓 23 座,隋唐墓 226 座,元明清墓 65 座。由此可知,隋唐是继汉晋以后织锦生产又一黄金时期。

1.3 新疆出土汉晋织锦和隋唐织锦数量占比

由 1.1 节可知,新疆出土织锦主要集中在汉晋和隋唐时期。已知出土的 138 例汉晋织锦中,铭文织锦 92 例,无字织锦 46 例,可见出土汉晋织锦中铭文织锦较多。从汉晋织锦出土地区看,新疆 103 例,内蒙古 16 例,湖南 5 例,西藏 3 例,甘肃 3 例,浙江 2 例,河北 1 例,湖北 1 例,湖南 1 例,出土地不详者 3 例,可见新疆出土最多,占比 74.64%。出土的 235 例隋唐织锦中,铭文织锦 9 例,无字织锦 226 例,可见出土隋唐织锦以无字织锦为主。从隋唐织锦出土地区分布情况看,新疆 95 例,甘肃 82 例,青海 41 例,北京 2 例,陕西 1 例,出土地不详者 14 例,亦以新疆出土最多,占比 40.43%。

2 新疆出土铭文织锦高频词语及纹样

通过梳理新疆出土的 85 例铭文织锦,发现其文字、纹样除固有的艺术美外,还饱含了浓厚的中华文化因子:文字含义深远,寓意深微;纹样类型多

样,符号性强。总体而言,新疆出土的铭文织锦更多地反映汉晋思想文化;无字织锦则在承袭汉晋文化的基础上,主要展现隋唐审美与精神风貌。文中以出土织锦中高频词语和主要纹样为切入点,将新疆出土织锦的情况与全国对比,进而分析新疆出土铭文织锦的价值。

2.1 铭文织锦高频词语

铭文(文字)本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铭文织锦中的铭文内容与当时的文化紧密相关,通过统计不同文字出现的频率可以了解一个时期的思想倾向。鉴于此,对比全国出土铭文织锦与新疆出土铭文织锦中的词语及其出现频次,比较两者高频词语的异同,以此讨论新疆出土织锦的重要性。

对全国出土 107 例铭文织锦词语的频数进行统计,依次为“寿”36 次,“子孙”29 次,“王”14 次,“乐”13 次,“富”“贵”11 次,“山”9 次,“登高”6 次,“永昌”3 次;新疆出土 85 例铭文织锦中,高频词语依次为“寿”31 次,“子孙”26 次,“乐”10 次,“王”“富”“贵”9 次,“山”7 次,“登高”6 次,“永昌”3 次。具体来看,新疆与全国出土铭文织锦的高频词语基本相同且差异甚微,仅在“乐”与“王”的出现频次上略有差别。对这些高频词语进行总结,可分成“康健长寿”“子孙绵延”“安富尊荣”3 类。

长寿文化自殷商就已产生,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珍视生命,渴望长寿,并对健康长寿之道积极探索。《尚书·洪范》曰: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28],“五福”中有三福与健康长寿密切相关。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开始从哲学角度阐释长寿问题,对健康长寿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措施。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的养生长寿之学成为主流,主张道医结合。而后佛教继承长生理念,注重修行转世,以永享长寿。总之,我国的长寿文化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并渐趋构成多元文化形态。

多子多福是中华文明延续传承的文化基石,早自商朝便已形成,“子孙昌隆”就被铸刻在青铜器上。西周时,氏族聚集而居,子孙的多寡被视为家族兴衰的象征,宗法制形成之后,人们更加注重子嗣的继承,《诗经》就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自此之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变换,统治者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人口数量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直至现在,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文化思想依然盛行。

“安富尊荣”一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状态。《孟

子·尽心上》提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富贵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后学者对其的认识不断加深,再通过创新和实践,形成独特的富贵文化。“富”与“贵”本身就是辩证关系,“富”指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追求,而“贵”则偏重于身份地位、精神人格的价值体系。“王侯贵族”集“富”与“贵”为一体,为世人所追求仰慕。随着人们对富贵的认识不断加深,“崇仁义而富贵”渐趋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富贵文化的精神内核,并传承至今。

从数量来看,我国共出土 107 例铭文织锦,其中新疆出土 85 例,在数量上占优势地位;从高频词语出现频次看,新疆出土铭文织锦上出现的高频词语基本涵盖全国出土铭文织锦上的词语,可见新疆出土铭文织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文化内涵看,新疆出土铭文织锦上文字彰显的“长生久视”“多子多福”“富贵安乐”思想,是当时我国社会思潮的生动反映,也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化认同、充实、发扬、融入的直观体现。因此,新疆出土铭文织锦之铭文,不仅是中国铭文织锦文字的集中代表,更是我国多元一体文化的生动见证,在时代传承创新中逐步沉淀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印记。

2.2 织锦主要纹样

织锦纹样虽不如织锦铭文的含义直观,但稍加对比亦可见社会思想变迁。据统计,铭文织锦多集中在汉晋,无字织锦多集中在隋唐。汉晋铭文织锦文字纹样交融共存,多为希冀福寿安康、羽化登仙等题材。至隋唐,无字织锦题材除崇仙慕神、神往瑶池,还有眷恋丰美富足、祝愿今世之美等。另外,除了社会思潮与文化内涵变迁,提花技术自经织锦向纬织锦的转变,亦促成了织锦纹样的演变。

2.2.1 铭文织锦的瑞兽祥云纹 出土铭文织锦上的纹样多是瑞兽、云纹等。107 例出土铭文织锦上瑞兽纹最多,共计 39 例,其中虎纹 7 例,马纹 6 例,禽鸟纹及对狮各 4 例,双羊、对龙、孔雀纹各 3 例,龟 1 例,此外 8 例图案模糊,已不能分辨瑞兽的具体样式;新疆出土 85 例铭文织锦中,瑞兽纹也占主要地位,有 23 例,主要包括虎纹 5 例,孔雀纹 3 例,马纹 2 例,对鸟纹 1 例,12 例不能分辨其具体样式。

瑞兽纹样作为我国传统纹样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寓意吉祥昌盛、辟邪平安。早在西周,青铜器上就已经铸刻象纹作为吉祥纹样,且后世一直沿用。纹样类型也越来越多,不仅包括虎、马、鸟等以现实为基础的写实纹样,还包括龙凤、麒麟等以想象为主的纹样。除织锦外,瑞兽纹也普遍装饰于铜镜上,如湖南长沙伍家岭西

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铜镜方框外饰以朱雀、玄武等瑞兽纹样；玉璧上也装饰瑞兽纹，如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神人瑞兽玉璧，浅浮雕琢双龙、双熊和一凤纹，繁简相宜，霸气张扬。此外，砖铭上也多出现瑞兽纹，汉画石铭：“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僚戏，众禽群聚，万兽云布”^[29]，把众多瑞兽的动作神态描写得栩栩如生。总之，瑞兽纹被刻画在多个载体之上，一直贯穿于中国纹样史，既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审美艺术水平，又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巨大财富。

云纹是我国的一种古老吉祥图案，除衣物外，还频繁出现于漆器、玉器等载体上，象征吉祥如意，步步高升。云纹在历史的衍变中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如茱萸云纹、穗状云、山状云、带状云、涡状云等。《论衡·乱龙》有：“神灵之气，云雨之类。”^[30]可见古人认为云具有神灵气蕴，因而云纹在中国传统纹饰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国出土的107例铭文织锦中使用云气纹的共36例，其中新疆出土的有19例。无论全国出土的云气纹织锦，还是新疆一地的，其纹样类型都包括茱萸云纹、穗状云、山状云、带状云、涡状云等。云气纹织锦出土数量和纹样类型均说明了新疆出土织锦的代表性价值。

出土铭文织锦中，云纹和瑞兽纹样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配合呼应。如“延年益寿”织锦（见图1），穗状云与带翼瑞兽布于其中，立鸟在侧，顾盼有情；“长乐明光”织锦（见图2）与“长寿明光”（见图3）织锦上瑞兽与山状云相互组合，瑞兽或为虎，或为翼兽，变幻多姿。还有云气纹瑞兽组合的纹样，瑞兽呈飞腾之状，云气若隐若现，缥缈灵动。总之，新疆出土铭文织锦纹样中，瑞兽纳气，祥云萦绕，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营造出仙气飘飘、祥光普照的飞升佳境^[31]。



图1 “延年益寿”织锦

Fig. 1 Brocade of "prolong life"



图2 “长乐明光”织锦

Fig. 2 Brocade of "changle mingguang"



图3 “长寿明光”织锦

Fig. 3 Brocade of "longevity bright light"

综上所述，新疆出土铭文织锦纹样在我国出土铭文织锦纹样中占有重要地位，且都以瑞兽纹、云纹为主。瑞兽纹和云纹的搭配，道家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思想，合以人间盛世的繁华多彩，织就出了新疆出土铭文织锦纹样天人合一、华彩向往的织锦语世界，也代表了我国铭文织锦纹样深厚的文化内蕴与多元美学审视。

2.2.2 无字织锦纹样

现已出土的无字织锦多为隋唐时期织造，其纹饰与大唐盛世的政治经济繁荣相应，相较汉晋铭文织锦更为华丽，纹样不断推陈出新，内容更加多元。具体来看，瑞兽纹不仅数量增多，种类也自成体系，除常见的龙凤纹，鹿、龟、鹤的组合样式也应用较多。道家的长生之学以精、气、神为核心，而鹿被视为精足之最，龟被视为气足之最，鹤被视为神足之最。此外，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花纹受到佛理思潮影响，灵植类纹样越

来越丰富,如颇具大唐风范的“宝相花”,分有“小窠”“中窠”“大窠”“团窠”4类,团花盛行,寓意荣贵祯祥,华美圆满。

451例出土无字织锦中,纹样主要以瑞兽纹和植物纹为主。瑞兽纹有182例,主要包括对鸟纹46例,对狮纹23例,对龙纹20例,双羊纹17例,对凤纹15例,双鹿纹13例,对马纹11例,孔雀纹8例,龟甲纹7例,猪头纹6例,鹤纹4例,12例未详细记载其具体内容;新疆出土139例无字织锦纹样中,也是瑞兽纹最多,有77例,具体包括对鸟纹19例,双鹿纹8例,双羊纹6例,对马纹、猪头纹各5例,对狮纹4例,孔雀纹3例,龟纹、龙凤纹、鹤纹、猪头纹各2例,19例未详细记载其具体内容。对比来看,新疆及至全国出土的无字织锦纹样都是以瑞兽纹为主,且具体图案样式相同,除习见吉祥翼兽之外,还增加猪头纹一类,图案纹饰愈加广泛多元,更具象形性。植物纹共有139例,其中新疆出土51例,植物纹纹样均包括宝相花、菊花、玫瑰花、莲花、茱萸、树纹、茎叶纹、葡萄纹等。

总体来看,新疆出土无字织锦纹样基本涵盖了我国出土无字织锦纹样种类,且划分类别相同,均是瑞兽纹占主体,再次为植物纹。新疆出土无字织锦纹样色彩丰富、造型生动,寓意吉祥安康、幸福如意,代表了我国无字织锦纹样的整体面貌。

2.3 织锦经织锦至纬织锦变换对纹样的影响

中国历代织锦纹样中的瑞兽纹、花纹、植物纹样式不断革新,纹样内涵愈加丰富,其原因除社会风尚由谶纬祈祥、长生久视转向崇信佛理外,还有织锦织造技术由经织锦转变为纬织锦。

《国语》:“天六地五,数之长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表明经线成为织物根本。自秦汉时始,织锦多是经线显花,为1/1平纹经重组组织织造的平纹经织锦,一直延续至初唐,但此技艺的局限性明显,一个花形单元的纬线循环根数少,花形纵向长度难以扩展。刘辉^[32]指出,汉晋织锦多由多综式提花机织造,织锦纹样呈上下对称布局,纬向循环为通幅,经向循环却很小。如新疆民丰县出土的汉晋铭文织锦,除“韩侃吴牢织锦友士”图案经向循环较大之外,其他织锦图案经向循环都不大。随着提花技术的提高,织锦纹样渐趋丰富,多以云气纹或山状纹为骨架,空隙之处填以文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融合程度加深,社会敬佛向道,文化结构变革,经织锦崇拜才得以终结,从西亚传来的新型纬织锦技术逐渐普及,造就了织锦饰纹样开放包容之态。

3 新疆出土织锦地位与价值

3.1 新疆织造技艺对中原的传承创新

养蚕缫丝是中华文明精粹之一。中原织锦至迟在西汉已传入新疆,正如尼雅遗址出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织锦所昭示的“合婚”一样,其应为诸如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亲时西汉王朝的赠织锦或赐织锦,由此可见西汉时织锦及其蚕桑技艺逐渐传入西域边疆。新疆哈喇和卓古墓88号出土了2件魏晋文书,其一背面为《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织锦契》,文曰“高昌所作黄地丘慈织锦”;其二背面为《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从翟绍远举织锦契》,文曰“交与丘慈织锦三张”。同墓出土的《杂物帐》记曰“疏勒织锦”等字样,且此墓出土“回纹织锦鞋”一双。可见,新疆至迟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本土丝织品的织造工业,制造地应包括疏勒、高昌(今吐鲁番市)等^[33]。故李文瑛^[34]指出,北朝时期新疆已有织锦生产,且新疆织造工艺和规格都独有特色且图案风格自成一派。

据统计,吐鲁番出土织锦109例,占总量19.57%,其中铭文织锦12例,具体是魏晋时期3例,隋唐7例,年代不详者2例;无字织锦97例,北朝—东晋时期11例,宋代4例,隋唐82例。总体来看,吐鲁番出土织锦多属汉晋及隋唐时期,与上述出土文书相互印证,可推测自魏晋始,吐鲁番便有织锦,至隋唐织锦织造更加繁盛,成为西域织锦的中心地区之一。西域传承中原织锦技艺,但不乏本土化特色,展现了万里同织锦的绵延光华。

3.2 新疆出土织锦的独特价值

新疆出土织锦图案兼收并蓄,丰富多样,极具思想内涵与审美情趣。在尼雅遗址(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元和元年”“长乐明光”等织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见图4)织锦护臂所用材料贵重,工巧精细,瑞兽与祥云相互呼应;“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巧妙布置其间,寓意祈求祥瑞。另外,此句吉祥语暗含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是我国古代星占用辞,用以祈求天下安定、国泰民安;“元和元年”织锦囊(见图5)纹样除文字外,以鹿纹与云纹为主。“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即公元84年,这一年份清晰地为该织锦囊的创作时间提供了参考,同时也见证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纪年的统一,文化艺术价值重大;“长乐明光”织锦(见图2)以舞动的龙纹为骨架,人物、天马、铭文分布其中,瑞兽形态活泼,整个

画面富有动感，色彩丰富。



图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Fig. 4 Brocade of "five stars leaving the east and benefiting China"



图5 “元和元年”织锦囊

Fig. 5 Brocade of "the fist year of Yuanhe"

新疆出土织锦珍奇富贵、品质奢华,价值极高。于志勇^[35]认为,新疆织锦出自汉地毋庸置疑,且文字纹样依据西域王侯的喜好进行了设计。周菁葆^[36]认为织锦多为西域朝贡中央时得到的赠赐。总之,以“五星”为代表的尼雅遗址出土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不仅体现了新疆出土织锦的精巧华贵、意义重大,也记载了中原王朝与边疆西域交流往来的历史史实,具有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的双重属性,集中展现了中国历代出土织锦面貌。

4 结语

织锦源自中原,中原王朝对西域贵族的织锦赠予,西域自身对织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创新,织锦铭文与纹样的深奥精微,不仅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英华,更昭示了中央与边疆万里同风的交往、交流、交融。文中对中国出土织锦数量的分析、对织锦铭文与纹样的探讨、对新疆出土织锦数量与重要性的详细阐释,揭示新疆出土织锦展现中国织锦面貌的史实,以期为后继研究织锦服饰、织锦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 侯灿. 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7): 23-39.
HOU Can.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ancient tombs in the suburbs of Loulan City [J]. Cultural Relics, 1988 (7): 23-39. (in Chinese)
- [2] 李遇春. 尼雅遗址的重要发现[J]. 新疆社会科学, 1998 (4): 37-46.
LI Yuchun. Important discoveries at the Niya site [J]. Xinjiang Social Sciences, 1998 (4): 37-46. (in Chinese)
- [3] 于志勇.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95MNI 号墓地 M8 发掘简报[J]. 文物, 2000(1): 4-40.
YU Zhiyong. Excavation report on M8 cemetery 95MNI at Niya site in Minfeng County, Xinjiang [J]. Cultural Relics, 2000 (1): 4-40. (in Chinese)
-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 1960(6): 13-27.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Summary of tomb excavation in north Astana, Turpan, Xinjiang [J]. Cultural Relics, 1960(6): 13-27. (in Chinese)
-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2(2): 7-9.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 363, Astana, Turpan [J]. Cultural Relics, 1972 (2): 7-9. (in Chinese)
-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J]. 文物, 1972(1): 8-29.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Brief report on the cleaning of Astana Hala and Zhuogu tombs in Turpan County [J]. Cultural Relics, 1972 (1): 8-29. (in Chinese)
- [7] 李亚栋. 1949 年以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发掘编号辑考[J]. 唐史论丛, 2019(1): 344-355.
LI Yadong. Collection of excavation numbers for the tombs of Astana, Hara, and Zhuo after 1949 [J]. Tang History Review, 2019(1): 344-355. (in Chinese)
- [8] 吐尔逊·艾沙. 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1983(1): 128-134.
Tuerxun Aisha. Excavation and preliminary study of Eastern Han tombs in the Luobnur region [J]. Xinjiang Social Sciences, 1983(1): 128-134. (in Chinese)
- [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99(1): 4-16.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 15 at Yingpan cemetery in Yuli County, Xinjiang [J]. Cultural Relics, 1999 (1): 4-16. (in Chinese)
-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新疆山普拉发掘报告[J]. 新疆文物, 1989(2): 1-48.

- Xin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Shanpu in Xinjiang, China [J]. *Xinjiang Cultural Relics*, 1989 (2): 1-48. (in Chinese)
- [11] 王博. 新疆且末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03(1): 89-136.
WANG Bo.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omb No. 1 in Qiemozha Gunluk, Xinjiang [J].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03 (1): 89-136. (in Chinese)
- [12] 龚国强.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J]. 考古, 1997(9): 21-32.
GONG Guoqiang. Excavation of the Jiawa Airik cemetery in Qiemo County, Xinjiang [J]. *Archaeology*, 1997 (9): 21-32. (in Chinese)
- [13] 王明芳. 新疆博物馆新收藏的纺织品[J]. 文物, 2009 (2): 83-89.
WANG Mingfang. New collection of textiles in Xinjiang Museum [J]. *Cultural Relics*, 2009 (2): 83-89. (in Chinese)
- [14] 郑隆.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 文物, 1961 (9): 16-18.
ZHENG Long. Investigation of the Zhabennuoer ancient tomb group in Inner Mongolia [J]. *Cultural Relics*, 1961 (9): 16-18. (in Chinese)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14(4): 563-587.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2012 excavation report of Gurujiamu cemetery in Gar County, Ali prefecture, Xizang [J].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14 (4): 563-587. (in Chinese)
- [16] 黄能馥,陈娟娟. 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310.
- [17] 许新国.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J]. 中国藏学, 1997(3): 67-82.
XU Xinguo. A study on the weaving brocade of the sun god pattern unearthed from the Tubo tomb in Dulan, Qinghai [J]. *Chinese Journal of Tibetan Studies*, 1997 (3): 67-82. (in Chinese)
- [18]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6): 4-11.
Wuwe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Mouzuizi Han tomb in Wuwei, Gansu [J]. *Cultural Relics*, 2011 (6): 4-11. (in Chinese)
- [19] 林梅村. 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织锦及其相关问题[J]. 中国历史文物, 2003(6): 48-49.
LIN Meicun. Islamic brocade unearthed in Dulan, Qinghai and related issues [J]. *Chinese Historical Relics*, 2003 (6): 48-49. (in Chinese)
- [20] 奥雷尔·斯坦因.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08.
- [21] 王炳华. 盐湖古墓[J]. 文物, 1973(10): 28-36.
WANG Binghua. Salt lake ancient tomb [J]. *Cultural Relics*, 1973 (10): 28-36. (in Chinese)
- [22] 魏松卿. 考阿拉尔木乃伊墓出土的织绣品[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60: 153-156.
WEI Songqing. Embroideries excavated from the mummy tomb of Koala [J]. *Journal of the Palace Museum*, 1960: 153-156. (in Chinese)
- [23] 李肖.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 2006(12): 47-72.
LI Xiao. Excavation report of Badamu cemetery in Turpan, Xinjiang [J]. *Archaeology*, 2006 (12): 47-72. (in Chinese)
- [24] 樊锦诗, 马世长. 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J]. 文物, 1972(12): 55-67.
FAN Jinshi, MA Shichang. Discovered Tang Dynasty silk fabrics and other cultural relics at Mogao Grottoes [J]. *Cultural Relics*, 1972 (12): 55-67. (in Chinese)
- [25] 赵丰. 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3.
- [26] 吴铭生. 长沙广济桥第五号战国木椁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57(2): 59-63.
WU Mingsheng. Brief report on the cleaning of the fifth Warring States period wooden coffin tomb in Guangjiqiao, Changsha [J]. *Cultural Relics*, 1957 (2): 59-63. (in Chinese)
- [27]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4(7): 39-68.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riefing on excavation of Han tombs No. 2 and No. 3 at Mawangdui, Changsha [J]. *Cultural Relics*, 1974 (7): 39-68. (in Chinese)
- [28] 许新国, 赵丰. 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1: 63-81.
XU Xinguo, ZHAO Feng.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silk fabrics excavated from Dulan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History Museum*, 1991: 63-81. (in Chinese)
- [29] 信立祥.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22.
- [30] 王充. 论衡[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207.
- [31] 陈寒蕾, 王树金, 夏添. 从吉祥文字纹看汉代着装风尚[J]. 服装学报, 2024, 9(1): 65-71.
CHEN Hanlei, WANG Shujin, XIA Tian. Looking at the dress fashion of Han Dynasty people from auspicious characters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1): 65-71. (in Chinese)

(下转第 174 页)